

三本地质学家的书

谢泳

《天山之麓》

黄汲清是著名的地质学家，1948年的老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后来又任学部委员，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。中国老一代地质学家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文学修养都很好。像丁文江、翁文灏、李世光、杨钟健、张其昀等，除了专业之外，他们写的文章都非常好看，那一代科学家，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一代学者，后来干他们这一行的，就不大行了，这可能是教育的缘故。

我偶然看到黄汲清的一本散文集《天山之麓》，独立出版社1945年在重庆出的，土纸印刷，约有十多万字。内有翁文灏作的序言。这是1942年，黄汲清到新疆考察地质时的一本游记，文笔清新，叙述简约从容，写新疆的风土人情，政治经济文化变革，都有独到见解，是一本了解新疆社会变迁的重要作品，虽然是游记，但很有见识，今天研究新疆的人，也大可一看。老一代中国科学家的文章，远非今天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可比，那类文化散文，并不到家，因为除了少见识外，文笔的做作是一望而知的。

黄汲清在新疆考察半年，这本游记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副产品，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光这点雅兴就让人产生敬意，更何况他写出的还是极好的散文呢！科学家的文字简约是没有问题的，但黄汲清的文笔却是简约中又不乏铺陈，他离开新疆时这样写：“5月10日早七时我们已来到迪化机场上。大地还和午夜一样的寂静，点点的残星仍高悬天空，微微的晨风正吹起征人的衣袖，忽听马达声隆隆，机师说：‘就起飞了’。我们只得匆匆和李厅长宋副官握手告别，大家说一声‘再会’，然后攒进昆仑号坐定，霎时间机身腾空而起，绕城一周，向南直穿天山而过。回首望迪化城已模糊不可辨识，只孤岛似的西山反映着朝阳，笑盈盈的向我们点头说‘后会有期’”。

这本《天山之麓》，写得从容不迫，叙事抒情非常得体，这很难得，不要说一个以文字为副业的人了，就是一个作家能有如此的文字感觉，也非易事。有时看了这些老辈科学家的文章，真有说不出的感慨，时代真是太偏爱他们了，干什么都是一流，不经意间做出的事，都让我们佩服好久。

看《天山之麓》，还引起我的另外一个感想。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新疆都特别感兴趣，这可能和他们心中长存的祖国统一思想有关，这和后来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。

储安平编《观察》周刊的时候，对新疆极有兴趣，发过很多关于新疆的文章。《观察》唯一出过的一次专集就是关于新疆问题的。他请了当时并不知名的周东郊来完成这个工作，刊在1946年第一卷《观察》的14期上。我一直以为，研究新疆问题，这个专集到今天也是非看不可的。后来储安平出“《观察》丛书”时，本来也收了周东郊关于新疆问题的一本专书，名为《新疆十年》，都在杂志上做了预告，但据周东郊的儿子前两年告诉我，那本书其实在国内并没有正式出版，只有油印本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这本书在新加坡出了。文革时，就是这本作者都不知道如何出版的书，倒给周东郊带来了“里通外国”的帽子，给他找了很多麻烦。这本《新疆十年》，我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文章，主要是在《观察》周刊上发表过的，我虽然是新疆问题的外行，但从一般的学术常识上判断，感到周东郊的新疆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五十年代初，储安平离开《新观察》以后，首选了新疆作为他考察的地方，他成为右派前所写的两本书，都是关于新疆的，这就是《玛纳斯河垦区》和《新疆新面貌》。不过这两本书，在储安平的写作生涯中，大体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记录。

《旅美见闻录》

张其昀的《旅美见闻录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46年10月初版，1947年3月再版）我有两本，初版本，有一年葛剑雄教授来太原，我送给了他。因为张其昀的专业是历史地理，与葛教授是同行。对于学者的随笔，我过去是看过就送人，我保存的通常是他们的专著，其实这些随笔对于有些学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

张其昀到美国那次，是应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的邀请，他在美国呆了两年。同批去美国的有当时国立大学的好几位教授，他们是中央大学蔡翘，西南联大金岳霖，武汉大学刘乃诚，四川大学萧作梁，云南大学费孝通，浙江大学张其昀，时间是1943年夏天。费孝通《初访美国》记载的就是这次经历，这本书当年在后方影响很大，八十年代与费孝通另外两本访问美国的书合在一起重新出版过，改名为《美国与美国人》。对于外访的游记，费孝通有一个看法，就是“介绍文化不是宣传，而是分析。宣传所引起的是感情，爱好或憎恶，可是分析所引起的是理解，超出了爱恶，而入于欣赏。分析所要根据的是全盘事实，决不是短期的观光者所能胜任的。”关于这次访美的经历，我只见到了费孝通和张其昀的书，其它几位不知道是没有写，还是写了我没有看到。

费孝通的书最好能与张其昀的书对比起来看，因为同样的美国，在两个中国教授的眼里还是各有一些自己的理解。他们对美国的认识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，但在细微处还是有差异。就写作风格论，费孝通接近于作家，而张其昀还是学者本色，文章还是费孝通的好，但张其昀书中的信息量要比费孝通大，特别是对美国当时的思想、教育科学与文化发展，都有很详细的介绍。比较起来，费孝通对美国的繁荣，赞赏中还有一些批评的意味，但张其昀对美国没有一点批评。张其昀特别赞赏美国的通才教育。他说：“教育必须兼顾通才与专才两方面，保持平衡，不使偏枯。专才教育之目的为分工，通才教育之目的为统一，统一与分工，为自由社会所不容偏废者。顾两者之关系非为并行之双轨，而为同根之树木。通才教育为其根干，专才教育乃其枝叶。其根干愈坚固者，则其枝叶亦愈繁茂。学河之道亦然，通与专，就业与做人，两者必须兼备于一身。通才教育可分为三部分，即人文学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，是皆人类之精神遗产。语其功用，一为了解自己，一为了解他人，一为了解宇宙。合知己知人与知天，而成为心之训练，其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思考力、表达力、判断力及辨别各种价值之能力，有通才教育以训练人心，复有专才教育经训练耳目手足，如是方可期为健全之社会、健全之公民。”（33页）当年在浙江大学，竺可桢是很倚重张其昀的，他的办事能力可能很强，但我印象中，学者对他的评价好象不是很好，据说当年胡适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，就是怕这个位置落在张其昀手里，这可能与他同蒋介石关系好有关。不管怎么说，张其昀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，前几年有位朋友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美国观的书，我就要他注意张其昀这本书，因为上一代知识分子中凡是能真实了解美国的，最后的选择相对要清醒一些，而对苏联发生兴趣的知识分子，最后都走向了绝望。

《杨仲健回忆录》

偶然看到古生物学家杨仲健的一本书《杨仲健回忆录》（地质出版社，1983年7月），这本回忆录是杨先生在七十年代末以前完成的，两三年后出版。因为专业的关系，这本书在文史界好象不引人注意。我也是近几年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时，才感觉到中

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个群体，很难把他们分开。在这个群体中，特别是中国现代的地质学家，他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，本来就不单纯是地质学家，像翁文灏、丁文江、李世光、黄汲清、张其昀他们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，远非今天的科学家可比。

杨仲健回忆录，在我所见过的八十年代初问世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回忆录当中，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本。八十年代初，杨先生对他早年的朋友，比如胡适、傅斯年他们，就已是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，所记都是他们的好事，下笔也特别有感情，今天看来这没有什么，但在二十年前，就用那样的态度来说当年新华社公布的战犯，不是很容易的。可能因为他是地质学家，回忆录的影响只在专业领域，所以自由也就大一点。中国早年的地质学家，作为一个科学家群体，其实很值得专门研究，特别是他们在专业以外对社会文化的贡献，光从科技史的角度观察，有时难以反映他们的全部人生。

中国早年的科学家，都有比较好的人文素养，杨先生更是一个喜欢写文章的人，他早年出版过好几本游记，可能因为是科学家的缘故，研究文学的人是不大注意了。我看过他五十年代初一本介绍古生物学的普及性读物《演化的实征与过程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52年），非常好看。杨先生早年对西方的科普读物就有兴趣，也有在这方面努力的自觉，加上他一生对文学的爱好，所以也是一个好散文家。

八十年代初，对于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时代，能平实客观叙述出来的人并不是很多，许多作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，比如茅盾的回忆录就很有问题，自毁的地方太多。这可能与写回忆录的年代有关。杨先生的回忆录有些章节是1949年前后写的，所以比较从容。他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写到中央研究院当年的院士选举，我以为是很真实的。我曾较多留意过这方面的材料，有一个比较的标准。

我对当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主要评价有三条，一是政治没有干扰；二是相对比较公正，三是学者自律程度很高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杨先生对它的回忆和评价。他说：“近年来，国内学术界闹得最热闹的，莫过于中央研究院关于院士之选举。研究院由蔡元培当领导，于成立不久即设有评议会。评议会会员之选举由国内各大学及有名之学术团体推荐，再由当然评议员选定。远在第二次选举之时，即有人推荐我为评议员候选人。傅斯年等极力促成，但未成为事实。后来评议会议决举行院士选举，其方式大致为由全国及学术机关推荐候选人，共得五百余名，再由评议会组成之审查会，对候选人之履历、论文予以审查，共定候选人一百五十名，公告以后证询意见，过一相当时期，再开会选定，由一百五十人中选出院士若干人。这个评议会依程序进行，选举于1948年夏举行，凡得票数达投票人的五分之四者，即可当选为院士。共投票五六次之多，选出院士八十一人，并规定以后每年增加十五人。我被各方面推为候选人，后来亦列入一百五十人之中，最后当选为院士。选举时，地质方面候选人方面有十二名，被选中六人，即朱家骅、翁文灏、李四光、谢家荣、黄汲清和我。此六人中，独朱对于地质方面的实际工作太少，然因别的原因（推进工作有功）而当选。此事为许多人所不满。

院士之当选，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。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，十分慎重，缺少弊端，其为一般人之重视，当亦在此。真正的饱学之士被遗漏者亦有其人。譬如裴文中连第一次推荐时即未被列入，而他却在近年来，尤其是在抗战期中，对学术工作很有成绩。1947年，我赴平时，正值各机关推荐候选人初步名单之时，胡适之曾问我：“何以中国地质机关方面未推荐裴文中，是不推考古界，还是正拟推荐？”但后来终于还是没有推荐。事后，我也听到许多对于选举院士不满意之怨言，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。大凡一事之举，欲求各方面均能如愿是不大可能的，好在大体方面并不很错，且以后还有补救机会，即每年仍有选出十五人之规定，第一次未入选者，以后仍有机会。”（166、167页）研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，杨先生的回忆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，可以帮助我们整体上把握这次选举的情况。

作家学者的回忆录，我看过不少，比较起来，在写回忆录方面，作家往往是最差的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，不一定有道理，算是一种阅读习惯吧！